

# 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sup>\*</sup>

刘瑞明 石磊

**内容提要:**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应该包含两种:一是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率损失,二是由这种效率损失进一步带来的其他效率损失。传统观点强调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率损失而忽略了第二种效率损失。本文针对国有企业的生存困境,提出国有企业的“增长拖累”这一概念,重新认识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所发展的观点是,国有企业不仅本身存在效率损失,而且由于软预算约束的存在,拖累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进度,从而对整个经济体构成“增长拖累”。利用中国1985—2004年29个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本文验证了这一思想。因此,就效率层面而言,推进国企改革是一条必然之路。

**关键词:**国有企业效率 生存困境 政府保护 软预算约束 增长拖累

## 一、导言

在国有企业改革30年后的今天来重新评述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已不再是什么新颖的题目。而且,人们似乎已经找到了国有企业效率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这应归功于30年中不断探索的理论工作者们。但是,当我们重新梳理国有企业效率的文献时,一个令人遗憾的发现是,迄今的国有企业效率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对经济增长的拖累,而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率上。对国有企业本身效率的关注无可非议,但是忽略这种效率低下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使人们不能进一步深入理解无效率的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危害,也无法说明为什么国有企业必须改革。本文意图针对国有企业的生存困境(Survive predicament),提出国有企业的“增长拖累”(Economic growth cumbrance)这一概念,重新认识国有企业的效率损失。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回答近年来争论不断的“国退民进”还是“民进国退”的问题。

虽然对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多有争议,但是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实证文献证实了这一点(林青松、李实,1996;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1995;姚洋,1998;姚洋、章奇,2001;刘小玄,2000;等)。相当一部分的国有企业处在亏损状态,即使有少数盈利的国有企业,也是由于其特殊的垄断地位。总体的情景是,国有企业处在生存困境之中,不仅自身效率低下,而且需要通过政府的保护和救助才能存活。在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当中,一个企业的存亡取决于其是否能在市场竞争中获胜,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将迫使企业不断创新以维持生存并获取利润。而国有企业却可以依赖另外两条途径(林毅夫、李志赞,2004):一是依靠政府补贴来救助亏损的国有企业,这也就是科尔奈(Kornai,1986)提出的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 SBC)现象;二是维护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限制市场进入以获取垄断利润。林毅夫、李志赞(2004)进一步指出,从一种更广义的概念来讲,维护国企的垄断地位实际也是一种补贴,是以损失社会效率为代价向国有企业提供的一种隐性补贴。这种补贴的形式大体有三类(樊纲,2000):一是财政支出的企业亏损补贴;二

<sup>\*</sup> 刘瑞明、石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200433,电子信箱:lmj@126.com。作者感谢高帆、寇宗来、马小勇、孙圣民、王贤彬和汤向俊等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本文的早期版本也曾在北京大学第六届经济发展研讨会和复旦大学博士生论坛汇报过,与会学者龚强、范子英、詹宇波、李剑、肖弋舟、易声宇、陈斌开、张三峰、许政等都提供了详细的修改建议,在此一并感谢。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是国有企业向银行借钱形成的“坏账”,由于这些坏账的最终买单者是政府或全体人民,所以最终导致“准财政赤字”;三是直接融资情况下发生的“坏股”。这些由非国有部门向国有部门的转移支付构成了事实上的“额外综合赋税”。依据如上认识,在本文中,我们将这两种途径通称为软预算约束,它是亏损的国有企业能够存活的重要支撑。这种软预算约束至少存在如下几种弊端:第一,软预算约束使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受到保护,损害市场竞争。第二,软预算约束诱发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一旦预期到软预算约束,国有企业就会选择一个低的努力水平,效率低下,带来效率损失。第三,软预算约束资金来自于政府的转移支付,而在国有企业普遍亏损的情况下,转移支付只能来自税收中民营企业的纳税部分,这使得民营企业的积累不足并可能挤出政府公共服务,从而影响其发展。以上三点构成了国有企业效率损失的主要途径。本文的写作思路正是沿着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和软预算约束的角度展开。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指出软预算约束下的国有企业不仅自身效率低下,而且构成了对民营企业的拖累,从而拖累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这是传统观点所忽视的。

## 二、文献综述

由于本文关注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率以及软预算约束带来的进一步的效率损失,所以本文的文献综述围绕国有企业的效率和生存困境与软预算约束的成因和后果展开。

### (一) 国有企业的效率与生存困境

关于国有企业的效率,大量的文献对其进行了研究。这些文献所取得的一个共同认识是,相对于其他所有制企业而言,国有企业效率十分低下,往往是各种所有制中表现最差的。改制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绩效。

从所有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角度出发,刘小玄(2000,2003)两次利用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数据比较发现,在不同的所有制结构中,私营个体企业的效率最高,三资企业其次,股份和集体企业再次,国有企业效率最低。并且,国有产权结构变量对于产业绩效具有明显的负效应,国有企业通常是与垄断、缺乏竞争的市场结构密切相关,而可竞争的市场结构与非国有产权或民营产权结构密切相关。夏立军、方轶强(2005)、Xu & Wang(1999)、Sun & Tong(2003)、姚洋(1998)、姚洋、章奇(2001)的研究也表明,国家股或国有股确实对公司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在比较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文献中,也得到了基本一致的认识。林青松、李实(1996)、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1995)的实证研究都发现,在多种产权形式的企业中,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最低。考察国有企业效率的另外一个重要视角是代理成本,实证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高昂,是众多所有制中最高的(平新乔等,2003;李寿喜,2007)。

就为什么国有企业会效率低下而言,国内理论界存在三种重要认识。第一种认识被称为“产权论”,认为国有企业低效根源于国家所有制下引发的一系列委托代理问题和效率损失(张维迎,1999);第二种认识认为在国家赶超战略实施中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政策性负担,从而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和软预算约束,导致效率低下(林毅夫等,1997)。第三种认识从国家和国有企业的隐性契约出发,认为国家不能做到退出该合约关系,从而无法约束国有企业,导致国企选择低效率并迫使国家无法放弃低效的国有企业(张军,1994)。这三种理论是互补的,都为理解国有企业低效提供了重要思路,而且,从政策含义上讲,它们导出的基本政策指向是一致的,都是改革国有企业,提高经济绩效,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体制。从实施结果看,这也得到了实证文献的支持,一些文献考察了企业改制前后效率的对比,基本的结论是企业的改制大大提高了企业效率和盈利能力、降低了代理成本和管理费用,而且在获得这些收益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大规模的失业问题和社会成本。总体来说,中国的民营化是富有成效的(白重恩等,2006;郝大明,2006;胡一帆等,2006)。

### (二) 软预算约束的成因与后果

当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一旦发生亏损或面临破产时,国有企业的经理会预期得到国家财政支持,而国家或政府常常通过追加投资、减税、提供补贴等方式,以保证其生存下去。这就是通常所指的软预算约束现象。软预算约束的提出者科尔奈(Kornai,1986)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类比为一种父子关系,他将软预算约束划分为程度不同的5个等级,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父爱主义”(Paternalism)是预算约束软化的重要原因。Dewatripont & Maskin(1995)阐述了这样一个逻辑:在非对称信息下,由于企业拥有项目是否赢利的信息,而银行只能在投资一期后获知此信息,在企业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时,企业和银行的利益不一致性便会导致出现企业的逆向选择,当银行在一期后发现项目的赢利性时,沉淀成本已经形成。在存在沉淀成本的条件下,银行继续投资的边际收益大于废弃该项目的边际成本,当银行被迫向坏项目继续投资时,软预算约束便产生了。简言之,预算约束软化是时间动态非一致性下银企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博弈结果。林毅夫及其合作者(1999,2004a,2004b)提出了政策性负担假说。他们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经济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承担着大量的战略性和社会性政策负担,与那些没有负担的企业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不具有自生能力。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策性负担和政策性亏损有可能加重企业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问题,导致更多的企业亏损和补贴,而这构成了软预算约束的源泉。Shleifer & Vishny(1994)分析了政治家控制下的软预算约束,认为政治家为获得政治资本希望增加就业水平,而作为对企业雇用过剩员工的补偿,财政补贴就会产生,从而产生软预算约束。钱颖一、罗兰(Qian and Roland,1998)从经济联邦角度,分析了财政分权和货币集权对软预算约束的形成和硬化的影响。他们的基本结论是,财政分权和货币集权有助于预算约束的硬化。注重于考察官僚体制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白重恩、王一江(1998)在一个官僚控制和监督的框架下分析了软预算约束的产生,认为资本所有权的集中化,以政府官员代理人监督资本投向的问题是软预算约束的重要原因。

软预算约束带来了大量的效率损失。其诱发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导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创新不足,还使得短缺经济持续进行(钱颖一,1994;林毅夫、李志赞,2004;柳建华,2006)。除此之外,软预算约束还是过高的银行呆坏账、风险资产组合和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黄海洲、许成钢,1999)。虽然随着改革的进展,软预算约束的症结不断得到遏制,但正如郑江淮(2001)指出的那样,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体制根源没有改变,国有银行既没有更大的动力监督国有企业贷款使用,也没有能力阻止国有企业不良贷款继续攀升和停止增加对国有企业贷款。软预算约束依然是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大顽疾。

### 三、模 型

本文的建模思路受到企业救助模型的启发,但本文对企业救助模型作了如下拓展:第一,我们考虑的经济是一个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政府的三部门模型,这更接近于现实状况;第二,模型中,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被赋予不同的效率参数,从而可以观察到效率参数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运行;第三,我们特别强调政府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模型中政府不仅可以向企业强制性征税,而且可以将税收配置在自身消费、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三种用途上,通过将政府公共服务包含在企业生产函数中,我们将这三个参数与效率联系起来,来观测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考虑这样一个经济,经济中有一个民营企业部门P(Private enterprise)、一个国有企业部门S(State-owned enterprise)和一个政府部门G(Government)。社会总产出 $Y$ 是民营企业 $y_p$ 和国有企业产出 $y_s$ 的加总,即 $Y = y_p + y_s$ 。政府向企业征税,为简化起见,我们假定税收由政府一次性确定一个外生给定

对该类模型的一个概要介绍,请参见本小宁(2005)。

的税收总额  $T$ ，其中，民营企业上交税收部分为  $T_p$ ，国有企业上交税收部分为  $T_s$ ， $T = T_p + T_s$ 。我们假定税收可以配置于三种用途，一是公共服务，二是自身消费，三是补贴国有企业。税收中用于公共服务的比例为  $\alpha$ ，用于政府自身消费的比例为  $\beta$ ，用于向亏损的国有企业转移支付的比例为  $\gamma$ ，政府追求平衡预算， $\alpha + \beta + \gamma = 1$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  $f(T)$ ，并且  $f'(T) > 0$  和  $f''(T) < 0$ 。进一步，假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部门的单位努力成本函数为二次型： $C_{k_i} = \frac{b}{2} e_i^2$ ， $i = p, s, b$  是一个努力成本系数。

假定企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y_p = A_p e_p f(T) + \epsilon_p; \tag{1}$$

$$y_s = A_s e_s f(T) + \epsilon_s; \tag{2}$$

其中， $y_s$  和  $y_p$  分别表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单位努力产量； $\epsilon_p$  和  $\epsilon_s$  为随机因素，服从均值为零，方差为  $\sigma^2$  的独立同分布。 $e_p$  和  $e_s$  分别代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努力程度。 $A_p$  和  $A_s$  是不同所有制的效率参数。

在以上假定下，我们考察企业的行为。

(一) 基准情况：无软预算约束

首先，考虑民营企业的实际收入  $v_p$ ，

$$v_p = y_p - T_p = A_p e_p f(T) - T_p + \epsilon_p; \tag{3}$$

因为  $E(\epsilon_p) = 0$ ，所以，

$$E(u_p) = A_p e_p f(T) - T_p - \frac{b}{2} e_p^2; \tag{4}$$

求一阶条件，可得：

$$e_p = \frac{A_p f'(T)}{b}; \tag{5}$$

同理，我们也可以得出国有企业的最优努力程度为：

$$e_s = \frac{A_s f'(T)}{b}; \tag{6}$$

进一步地，我们有：

$$\frac{\partial e_i}{\partial A_i} > 0; \frac{\partial e_i}{\partial f'(T)} > 0; \frac{\partial e_i}{\partial b} < 0; i = p, s; \tag{7}$$

从地方税收的实际操作上说，这一假设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税收的真实情况。中国的税制在过去的三十年历经多次变革。虽然每次变革后地方政府的税收规则、税收动力都有不同，但是，收税的过程中存在着税收成本过高、企业漏报瞒报等情况的问题非常严重，导致了税收中的“滴、损、漏、失”。因而，要想做到完全的税收是不可能的，这样地方税收中普遍采取一种“包死基数，逐年递增”的方式，税务部门每年都会下达一个预定的税收计划，这一计划逐级下批，最后甚至落实到每一个税收人员头上，税务人员每年都需要“完成一定的被分配的税收额度”。同时，由于税收部门的“棘轮效应”，每年税务部门都不敢过度的超额完成任务，因为一方面，本年超额完成的税收来自地方企业，企业积累不足会导致下一期税收不足，另一方面，本期税收过高会使上级部门在下一期制定一个更高的税收计划，对下级税收部门本身是不利的。这样，有了上下两种限制，现实中的情况非常接近于一次性税收总额情况。当然，现实情况要复杂的多，这里只是一个简化。

之所以考虑这三种用途是基于如下理由：第一，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职能所在，也是其进行强制征税的法律基础，这里公共服务包括各类社会基本制度保障的提供、基础设施、政府服务效率等。第二，政府运作并不是无成本的，和企业一样要为政府人员提供薪金、各种福利待遇，这些政府自身消费部分也来自于税收。第三，作为转型经济国家，国有企业可能承担大量的政策性负担，比如雇佣过多的员工以解决失业问题、承担部分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功能等（林毅夫等，1997），作为补偿，政府就要对国有企业进行补贴。正如前所述，它们通过各种形式构成了国家的综合负债，最后要通过税收来支付。因此，我们在本模型中着重考察这三类税收配置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不失一般性，我们假定  $A_p > A_s$ ，正如我们在文献综述里所看到的，这一假定得到了实证文献的支撑。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到命题一:

命题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努力程度取决于所有制效率参数、政府公共服务和努力成本。所有制效率参数和政府公共服务的提高将提高企业的努力程度,而努力成本的提高将降低企业的努力程度。

我们接下来考察软预算约束下企业的努力,对国有企业的考察我们发现,软预算约束降低了国有企业的努力程度。

(二)扩展情形 1:存在软预算约束但并不挤出公共服务

由于存在软预算约束,当国有企业处于生存困境时,也即当国有企业的产出低于某一固定值  $u$  时,政府将对国有企业进行补贴。 $u$  是国有企业的保留收入。我们先考虑该补贴并未超过政府专门用于对国有企业亏损补贴的份额  $T$  的情形。此时,国有企业的收入可以表示为:

$$v_s = \begin{cases} A_s e_s f(T) - T_s + s, A_s e_s f(T) - T_s + s > u \\ u, A_s e_s f(T) - T_s + s < u \end{cases}; \quad (8)$$

软约束程度为  $u$  与  $A_s e_s f(T) - T_s + s$  之差,国有企业的保留收入  $u$  越高,软预算约束程度越高。

此时,国有企业的效用为:

$$u_s = v_s - \frac{b}{2} e_s^2; \quad (9)$$

因为,

$$A_s e_s f(T) - T_s + s > u; \quad (10)$$

所以,

$$s = u - A_s e_s f(T) + T_s; \quad (11)$$

则有,

$$\begin{aligned} E(u_s) &= \int_0^{\infty} v_s f(s) d_s - \frac{b}{2} e_s^2 \\ &= \int_0^{u - A_s e_s f(T) + T_s} (A_s e_s f(T) - T_s + s) f(s) d_s + u \int_{u - A_s e_s f(T) + T_s}^{\infty} f(s) d_s - \frac{b}{2} e_s^2 \end{aligned} \quad (12)$$

求一阶条件并化解,可得:

$$e_s^* = \frac{A_s f(T)}{b} \int_{u - A_s e_s f(T) + T_s}^{\infty} f(s) d_s; \quad (13)$$

根据概率密度性质,  $\int_{u - A_s e_s f(T) + T_s}^{\infty} f(s) d_s < 1$ , 所以

$$e_s^* < \frac{A_s f(T)}{b}; \quad (14)$$

上式表明,软预算约束下国有企业的最优努力程度要低于无软预算约束时的努力程度。

我们进一步考察软预算约束的程度和努力程度之间的关系,可以求得,  $\frac{de_s}{du} < 0$ 。这意味着软约束程度的增加将导致努力程度的减弱。因此,我们立即可以得到:

命题二:软预算约束情形下,国有企业会产生道德风险,国有企业的努力程度会降低,软预算约

束的程度越大,道德风险越严重,努力程度越低。

除了带来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外,软预算约束也会带来民营企业的效率损失。而且,从现实来看,政府作为国有经济部门,其自身消费比例如果不受到约束,也会给经济效率带来损失。我们考虑国有企业亏损补贴和政府自身消费对税收和公共服务挤出的情形。

### (三) 扩展情形 2: 软预算约束对税收和公共服务的挤出

软预算约束的程度有时如此之大,补贴会超过政府专门用于对国有企业亏损补贴的份额  $T$  的情形。这时,软预算约束在我们的模型中会通过两种途径对经济效率产生影响,一是政府通过减免国有企业税收的方式补贴国有企业;二是通过提高用于补贴的比例。

我们先来考虑政府通过减免国有企业应付税收的方式补贴国有企业的情况,假定减免后国有企业的应付税收降为  $T_s^*$ ,  $0 < T_s^* < T_s$ ,为简化起见,我们假定此时政府可以通过采取两种措施应对。第一,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民营企业的税负水平以弥补总税收;第二,政府也可以不采取该种措施使总税收水平下降。

措施 1: 政府通过增加民营企业的税负水平弥补总税收。相应地,民营企业税负变为  $T_p^*$ ,  $T_p^* = T_p + T_s - T_s^* > T_p$ ,总税收保持不变。根据基准情况的讨论,此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努力水平不会改变,但是民营企业的实际收入会由  $v_p = y_p - T_p$  下降到  $v_p^* = y_p - T_p^*$ ,  $v_p^* < v_p$ 。在实际收入压缩的情况下,民营企业的积累和发展就会相应受到抑制。此时,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拖累部分可以表达为  $v_p - v_p^*$ 。

措施 2: 政府维持民营企业税负水平不变。则有  $T_p^* = T_p$ ,此时总税负水平下降,  $T^* < T$ 。由于公共服务水平依赖于总税收  $T$ ,此时,会挤出公共服务,  $f(T^*) < f(T)$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产出水平都会下降,  $y_s^* < y_s$ ,  $y_p^* < y_p$ ,总产出下降,  $Y^* < Y$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积累都会受到抑制。另外,根据基准情形的讨论,我们知道企业的努力水平和公共服务呈正相关关系,因此,总税收的下降也将导致企业努力水平的下降。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和整体经济形成的拖累分别为  $y_p - y_p^*$  和  $Y - Y^*$ 。

我们接下来考察政府通过提高用于补贴的比例来补贴国有企业的情况。利用前面的式(7)容易得知:

$$\frac{\partial e_i}{\partial f(T)} > 0, \text{ 并且 } f'(T) > 0, \text{ 所以, } \frac{\partial e_i}{\partial T} > 0; \quad (15)$$

又由于  $\alpha = 1 - \beta$ , 可知,

$$\frac{\partial e_i}{\partial T} < 0, \frac{\partial e_i}{\partial T} < 0; \quad (16)$$

进一步,

$$\frac{\partial^2 e_i}{\partial A_i \partial T} > 0, \frac{\partial^2 e_i}{\partial A_i \partial T} < 0, \frac{\partial^2 e_i}{\partial A_i \partial T} < 0; \quad (17)$$

当政府通过提高用于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比例时,必然挤占政府用于公共服务和政府自身消费的比例,一般而言,政府自身消费存在刚性,因此,只能挤出公共服务。如果政府消费部分的约束也是软的,那么政府公共服务比例遭到政府自身消费比例和国有企业亏损补贴比例的同时挤压。此时,政府公共服务比例下降,这使得  $f(T)$  下降。并且,容易知道效率参数  $A_i$  越高,下降引起的效率损失越严重。总结如上讨论,可以得到:

命题三:在软预算约束下,国有企业亏损和政府自身消费由于不能得到有效约束,会对税收和公共服务产生挤出,降低企业实际收入和努力水平,从而使得经济效率受损。并且,所有制效率参数越高,公共服务挤出所带来的效率拖累越大。软预算约束下的国有经济拖累了经济增长。

以上三个命题的经济含义告诉我们,在国有企业效率相对低下和政府对企业存在软预算约束的双重条件下,国有企业不仅会因为自身效率对经济增长进行阻碍,而且会通过道德风险和软预算约束的形式拖累民营企业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得到损害。根据如上讨论,我们可以提出两个可检验的假说:

假说 1: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越慢。

假说 2: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地区,民营经济增长速度越慢。

其中,假说 1 的提出是为了验证有关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对国民经济拖累这一论断;假说 2 的提出是验证国有企业效率损失会拖累民营经济增长的思想。下面对这两个假说进行验证。

#### 四、实证检验

本文选取 1985 年至 2004 年中国大陆 29 个省级(直辖市、自治区) 非平衡面板数据对前文逻辑加以验证。沿着前文的理论思路,我们重点检验国有经济是否拖累了经济增长速度这一假说。因此,通过观测国有经济比重对地区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来检验,由于地区经济增长率还受到其他经济变量的作用,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所有数据和变量定义在表 1 中。

##### (一)数据和变量定义

表 1 数据和变量定义

变量性质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计算方法	预期符号
被解释变量	Regdp	地区 gdp 增长率	(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 100)/100	
	Pergdp	地区人均 gdp 增长率	(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 100)/100	
	Nsoer	地区非国有经济增长率	(地区当年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地区上年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 - 1	
核心解释变量	Soe	国有经济比重	地区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地区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	-
	Soe2	国有职工比重	地区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地区职工总人数	-
控制变量	Gbv	政府作用	地区政府消费额/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
	Ubr	城市化率	地区非农人口数/地区总人口数	+
	Far	投资增长率	(地区当年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地区上年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 - 1	+
	Edu	教育水平	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地区总人口	+
	Fdi	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
	Gdp	宏观经济波动指数	(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指数 - 100)/100	+
	Open	开放程度	地区进出口总额/地区国内生产总值	+

注:所有数据都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各年统计年鉴。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额和地区进出口总额的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我们通过各年中间汇率进行了相应换算。所有变量因为进行了相应换算,都是无量纲的。预期符号中“-”代表效应为负,“+”代表效应为正,“?”代表效应不确定。

为了度量地区经济增长,我们选择了“地区 gdp 增长率”(Regdp)和“地区人均 gdp 增长率”(Pergdp)来分别对之加以测度。民营经济增长速度用“地区非国有经济增长率”(Nsoer)加以度量。我们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地区国有经济比重,依照文献的普遍做法,我们选取“国有经济比重”(Soe)作为代理变量,为测度该指标的稳健性,我们还计算了“国有职工比重”(Soe2)来作为替代性度量指标,如果假说成立,则其符号显著为负。在控制变量中,我们控制了一系列变量,其中“政府作用”

由于重庆和西藏部分数据严重缺失,我们未考虑这两个地区。

(Gov) 指标用以控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由于统计年鉴中政府消费部分既包含公共服务支出又包含了其他政府消费,无法有效分解,因此,这一指标的效应有正有负,其符号不能确定,但是根据一些理论和实证文献,过多的政府干预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伴随着城市化过程,因此选取“城市化率”(Ubr)用以控制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选取“投资增长率”(Far)控制投资的作用。宏观经济形势也会影响当年地区经济增长,因此选取“宏观经济波动指数”(Gdp)作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控制。考虑到教育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也选取“教育水平”(Edu)作为对教育的控制变量。对外开放方面,根据文献的普遍做法,选取“外商直接投资率”(Fdi)和“开放程度”(Open)作为控制变量。我们在表1中详细列出了这些变量的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

## (二)方法

本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固定效应(FE)—随机效应(RE)分析法来研究国有经济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考察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效应。为此,我们重点考察解释变量国有经济比重  $Soe$  对被解释变量  $Regdp$ 、 $Pergdp$  和  $Nsoer$  的影响,观测结果是否和预测一致。

我们提出如下的实证模型:

$$Y_{it} = C + \beta_1 * Soe_{it} + \beta_2 * Control + \beta_3 + \mu_{it} \quad (18)$$

其中,  $Y$  是被解释变量,在不同的回归方程中分别代表  $Regdp$ 、 $Pergdp$  和  $Nsoer$ ,下标  $i$  和  $t$  ( $t = 1985, \dots, 2004$ ) 分别代表第  $i$  个省份和第  $t$  年,  $Control$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beta_i$  表示选取固定效应模型时各地区有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  $\mu$  是残差项。

## (三)计量结果

利用 stata10.1,我们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计量结果显示在表2中。

观察表2中(1)至(3)式的计量结果,我们发现,国有经济比重指标  $Soe$  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且,对不同的模型进行估计时,这一数值基本上保持一致,这说明解释变量  $Soe$  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度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国有经济比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另外可以发现的是,政府消费比重对地区经济增长率产生显著的负效应,控制不同的变量后,这一数值变化较大,但是均可以发现,过高的政府消费比重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 $Fdi$  对经济增长率具有非常显著的正效应,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宏观经济波动指数  $Gdp$  的计量结果显示,地区经济增长与全国经济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同步性。城市化率  $ubr$  对经济增长率也有着积极作用,但在可接受的水平上并不显著。在我们的回归中,教育的作用不能确定,这可能和教育的性质有关,教育是影响长期经济绩效的变量,短期内的效应并不明显。开放程度的作用也不能确定。我们利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Pergdp$  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的结果与  $Regdp$  类似,用国有职工比重  $Soe2$  代替国有经济比重  $Soe$  作稳健性检验,结果类似,因此,并未报告。(4)至(6)式是对非国有经济增长率  $Nsoer$  的回归结果,与对整体经济增长率的回归结果类似,国有经济比重指标  $Soe$  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国有经济比重对非国有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另外可以发现的是,政府消费比重与非国有经济增长率负相关,控制不同的变量组合后,这一数值变化较大,但是均在可接受的显著性水平上不显著。 $Fdi$  和  $Gdp$  对地区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显著为正,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全国宏观经济波动对地区非国有经济具有积极作用。 $Ubr$  和  $Open$  的系数虽然并不符合预期,但在可接受的水平上并不显著。 $Edu$  的符号为负的理由如前,教育的作用可能在短期内无法显现。虽然控制变量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尚不明朗,但是各个模型都显示,就我们关心的国有经济对地区经济增长是否具有不良影响这一问题,上述计量结果很好地对我们的假说进行了验证。由于转型经济的特殊性,一些大的制度变迁有可能会对其中的作用机制



表 2 计量结果 (1985—2004)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Regdp (地区经济增长率)			Nsoer (地区非国有经济增长率)		
	(1)	(2)	(3)	(4)	(5)	(6)
Soe	- 0.0598 (0.0154) ***	- 0.0616 (0.0100) ***	- 0.0625 (0.0103) ***	- 0.5018 (0.0795) ***	- 0.5729 (0.0899) ***	- 0.6471 (0.0939) ***
Gbv	- 0.1097 (0.0540) ***	- 0.0864 (0.0414) **	- 0.0647 (0.0437)	- 0.0657 (0.2801)	- 0.4077 (0.3190)	- 0.1183 (0.3230)
Fdi	0.4191 (0.0554) ***	0.4011 (0.0542) ***	0.4088 (0.0532) ***	0.3898 (0.2868)	0.2541 (0.3039)	0.1427 (0.3597)
Gdp	0.3008 (0.0706) ***	0.2880 (0.0708) ***	0.2896 (0.0714) ***	1.2607 (0.3649) ***	1.4335 (0.3888) ***	1.4872 (0.3924) ***
Far	0.0482 (0.0108) ***	0.0526 (0.0108) ***	0.0502 (0.0109) ***	1.0390 (0.0559) ***	1.0323 (0.0593) ***	1.0343 (0.0597) ***
Ubr			0.0047 (0.0082)		- 0.0454 (0.1084)	- 0.1237 (0.1117)
Edu		- 0.0431 (0.1709)	0.0681 (0.1703) *			- 4.7488 (1.5597) ***
Open		0.0131 (0.0079) *	- 0.0141 (0.0083) *			- 0.0928 (0.0683)
常数值	0.0937 (0.0147) ***	0.0941 (0.0091) ***	0.0879 (0.0100) ***	0.2288 (0.0760) ***	0.3322 (0.1047) ***	0.5473 (0.1226) ***
R <sup>2</sup> (within)	0.2999	0.3070	0.3256	0.6114	0.6092	0.6129
R <sup>2</sup> (between)	0.6960	0.6555	0.36609	0.1088	0.0601	0.0080
R <sup>2</sup> (overall)	0.3368	0.3458	0.3633	0.5525	0.5261	0.4458
F 检验值	45.23			165.22	121.33	89.86
Wald 检验 p 值		0.0000	0.0000			
Hausman 检验 值 (P 值)	12.57 (0.0278)	9.69 (0.2066)	10.01 (0.2643)	20.36 (0.0011)	23.54 (0.0001)	44.83 (0.0000)
观测值	562	551	493	559	502	491
组数	29	29	29	29	29	29
备注	FE	RE	RE	FE	FE	FE

注: (1) 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 (2) \*, \*\*,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 5% 和 1%; (3) Pergdp 做被解释变量的结果与此类似, 为简化起见这里未报告该结果; (4) 用国有职工比重 Soe2 代替国有经济比重 Soe 作稳健性检验, 结果类似, 为简化起见这里未报告该结果; (5) 考虑到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 我们将面板数据分为 1985—1994 和 1995—2004 两个时段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类似, 为简化起见这里未报告该结果; (6) FE 估计的 Hausman 检验的零假说是 FE 与 RE 估计系数无系统性差异。 (7) <sup>2</sup> 为负时取随机效应。

和结果产生影响, 在我们所选取的时段内, 1994 年进行的分税制改革就是这样一项变革, 因此, 我们将面板数据分为 1985—1994 年和 1995—2004 年两个时段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类似, 为简化起见这里未报告该结果。就模型考察的核心解释变量 Soe 而言, 其结果不依赖于控制变量的改变而改变, 我们曾控制了不同的变量组合, 结果发现, Soe 不仅都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 而且数值基本维持不变, 因此其结果是稳健的。从这些计量结果看, 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支持了我们的理论假说。

## 五、结 语

国有企业效率的争论纷繁复杂, 然而就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对经济增长的拖累这一问题, 学界研

究得还不够,本文从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入手,分析了国有企业对增长拖累的机制。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不仅本身存在效率损失,而且由于软预算约束的存在,其拖累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进度,从而对整个经济体构成“增长拖累”。利用1985—2004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对这一假说进行了初步验证,结果支持了前述理论。这为回答近年来争论不断的“国退民进”还是“民退国进”的问题提供了依据。

但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可能会面临一些质疑和批评。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可能疑问和批评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种批评是国有企业改革可能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虽然这种观点体现了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观点并没有注意到国有资产运作过程中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如果考虑到国有资产运作过程中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人们就会发现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白永秀、严汉平,2005)。第二种批评是国有企业改革会导致大量的裁员和减薪,这可能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实证文献的结果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黄玲文、姚洋(2007)通过对11个城市386家企业从1995年到2001年的面板数据的研究,评估了企业改制对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和一般印象相反,改制显著地减缓了就业的下降趋势。而且,改制对企业的就业增长有持续的和递增的积极作用。Megginson et al(1994)发现,民营化公司在净收入、产出、盈利能力、运营效率、员工人均销售收入、资产规模、红利支付等方面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而财务杠杆显著下降,并且没有发现民营化导致就业下降的证据。第三种批评是国有企业改革可能导致国家对价格的控制不力,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看到,国家对价格的控制正是中国经济改革中价格扭曲使得资源不能得到合理配置的重要源泉。第四种批评是国有企业以逃税为目的而隐瞒利润的动机比私有企业弱。实证研究(白重恩等,2006)发现,改制后企业产品的价格水平略有下降,企业上缴的税收金额较改制前没有明显变化。

我们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担心主要来自政府的既得利益团体。因为在政府为什么会放弃国有企业的产权的问题上,政府更多的考虑是财政收入,经济效率只是作为间接因素考虑(王红领等,2001;姚洋,2003;等)。正如平新乔(2004)所指出的那样,政府对失业和降低控制权收益(来自对国有企业直接的控制权)的担心是国有企业民营化或破产清算的重大障碍。由于背后存在巨大的物质利益,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的控制和对产业实施的控制与保护,对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与商品市场等要素市场的效率造成了损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一个重要推断是,进一步的产权改革是国企改革必要条件。

## 参考文献

- 白重恩、路江涌、陶志刚,2006:《国有企业改制效果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8期。
- 白永秀、严汉平,2005:《走出国有企业退出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误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
- 樊纲,2000:《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经济研究》第1期。
- 黄玲文、姚洋,2007:《国有企业改制对就业的影响——来自11个城市的证据》,《经济研究》第3期。
- 郝大明,2006:《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效率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第7期。
- 胡一帆、宋敏、张俊喜,2006:《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绩效研究》,《经济研究》第7期。
- 刘小玄,2000:《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1995年全国工业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第2期。
- 刘小玄,2003:《中国转轨经济中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产业绩效水平的决定因素》,《经济研究》第1期。
- 林青松,1995:《改革以来中国工业部门的效率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第10期。
- 林青松、李实,1996:《企业效率理论与中国企业的效率》,《经济研究》第7期。
- 林毅夫、刘明兴、章奇,2004:《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8期。
- 林毅夫、李志赞,2004:《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经济研究》第2期。
- 林毅夫、蔡方、李周,1997:《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上海三联书店。
- 柳建华,2006:《银行负债、预算软约束与企业投资》,《南方经济》第9期。

- 李小宁,2005:《组织激励》,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 李寿喜,2007:《产权、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经济研究》第 1 期。
- 平新乔、范瑛、郝朝艳,2003:《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第 11 期。
- 平新乔,2004:《政府保护的动机与效果——一个实证分析》,《财贸经济》第 5 期。
- 王红领、李稻葵、雷鼎鸣,2001:《政府为什么会放弃国有企业的产权》,《经济研究》第 8 期。
- 夏立军、方轶强,2005:《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 5 期。
- 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1995:《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率变动趋势的估计及其可靠性分析》,《经济研究》第 12 期。
- 姚洋,1998:《非国有经济成分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经济研究》第 12 期。
- 姚洋、章奇,2001:《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分析》,《经济研究》第 10 期。
- 郑江淮,2001:《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了吗?——对 1996—2000 信贷约束政策的有效性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 8 期。
- 张军,1994:《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企业:从“退出”角度的分析》,《经济研究》第 4 期。
- 张维迎,1999:《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
- Bai, Chong-en and Wang Yijiang, 1998, “Bureaucratic Control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 26:41—61.
- Dewatripont, Mathias and Maskin, Eric. ,1995, “Credit and Efficiency in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Economi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2 (4), pp. 541—56.
- Huang, Haizhou and Chenggang Xu. 1999,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East Asia”,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3: 4—6, pp. 903—914.
- Kornai, Janos. ,1986,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Kyklos*, 39 (1), pp. 3—30.
- Kornai, Maskin and Roland. ,2003, “Understanding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1 (4), pp. 1095—1136 (42)
- Lin J. Y. ,and Tan, G. ,1999,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2) ,pp. 426—431
- Meggison, William, Robert Nash, and Matthias van Randenborgh, 1994, “The Financial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Newly Privatized Firms: An International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Finance*, June, 49(2) ,pp. 403—452.
- Qian, Yingyi. , 1994, “A Theory of Shortage in Socialist Economies Based on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1)pp. 145—156.
- Qian, Yingyi and Gérard Roland, 1998,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5) ,pp. 1143—1162.
- Shleifer, Andrei, Vishny, Robert W. ,1994, “Politicians and Fir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4) , pp. 995—1025.
- Sun, Q. and W. ,Tong, 2003, “China Share Issue Privatization: The Extent of Its Succes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0:pp. 183—222.
- Xu, X. N. and Wang, Y. 1999, “Ownership Structur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the Case of Chinese Stock Compani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0:pp. 75—98.

## The Dual Efficiency Los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Economic Growth

Liu Ruiming and Shi Lei  
(CCES,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efficiency los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kinds: First is the efficiency loss of the SOEs, Second is the further efficiency loss brought about by the SOEs' efficiency loss itself. On the basis of the survive predicament of the SO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new concept of “Economic growth cumbrance” to investigate the SOEs' efficiency loss again. The view developed in our paper is that the SOEs do not only have efficiency loss in itself but also drag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PEs) development because of the government protection on the SOEs, and the whole economic growth would be dragged. The direction we indicate is that it is a inevitable way to take further step in the SOEs reform.

**Key Words:** Efficiency of SOEs; Survive Predicament; Government Protection; Soft Budget Constraint; Economic Growth Cumbrance

**JEL Classification:** E620, L330, O100

(责任编辑:晓 喻)(校对:晓 鸥)